

18 08

桑植

革命烈士紀念塔



桑 植 文 史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桑植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编：肖盛颜
副 主 编：张玉林
责 任 编 辑：张玉林 吴 龙
封 面 摄 影：曹开胜
封面设计题字：周扬声

桑植文史

第三辑

编辑 政协桑植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刷 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170,000 印数1000
版次 1992年7月 第一版
印次 1992年7月 第一次印刷

湘文准字(1992)第01号

定价：3.00元

桑植文史

第三辑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 国际公法研究员陈伯陶 朱泽云 (1)
- 杨云阶自传 (6)
- 刘开锡烈士传略 满廷炎 (10)
- 贺龙慈母王金姑事略 张玉林 (19)
- 土家才子廖茂才 张玉林 (22)
- 暂二师参谋长黄世一 黄治才 (24)
- 谷毓英传略 谷绍尧 谷忠云 口述 (30)
- 陈少南其人 陈岳生 (32)
- 彭作则生平简介 余忠贞 (36)
- 澧源文宗谷天泽 陈岳生 (38)
- 女诗人刘双环 谷忠诚 (40)
- 桑植第一位女塾师彭碧筠 陈克勤 陈沛然 (43)

时 代 足 迹

桑榆忆桑更添情

- 访解放后桑植县第一任县长马效云 曹开胜 (46)

闪光的足迹

- 记桑植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刘真志 谷忠诚 (51)

EA68/10

马县长在我心中	杨宏儒 (55)
阎德茂同志在桑植	陈启格 (58)
记周振岗同志二、三事	谷忠显 (61)
桑植解放后第一支工作队	吴宏侠 (65)
解放后桑植第一次通航	谷忠显 吕述 (70)
忆桑植县第二区人民政府的建立	李信安 (73)

创 业 史 话

双泉水库创业始末	李可特 (77)
桑植水利第一坝——南康坝	李可特 (84)
桑植县水泥厂的兴建与发展	张玉林 张新俭 (88)
西界林场发展概况	杨宏儒 (96)
陈家河农场今昔	吴 龙 (99)
桑植国营商业发展的轨迹	张惠民 (106)
创建水田坪麻风村前后	谷忠诚 戴潜坤 (114)

苏 区 文 化

苏区布告	(118)
苏区歌谣	(122)
苏区标语口号	(127)

抗 日 烽 火

抗日烈士陈士伯	张玉林 (129)
附：摘自《浙江省海宁抗战八年大事记》	

血洒疆场 名垂千秋	龚尚群(135)
附:《奉贤县志资料》第九辑载王子隆抗击日寇的事迹	
远征军团长谷剑侠	谷志旺(140)
记抗日救亡宣传队活动片断	张玉林 陈克勤(146)
血战九岭 保卫雄关	陈岳生(149)
滑石片伏击战	肖瑞林(151)
忆抗日战争片断	熊金成(156)
常德会战亲历记	陈岳生(165)
抗日救亡诗歌二首	桑政文(169)

民 俗 风 情

土家族婚俗	张玉林(171)
土家族待客礼仪	尚立喜(175)
白族游神	谷忠诚 谷励生(178)
回族风韵	桑政文(180)
苗族风情录	张玉林(184)
新屋落成上樑祝词	张泽球(188)

往 事 勾 沉

桑植县陈、何两派斗争始末	熊贤澄(196)
从穷学生到军统特务	向贤哲(207)
从小姐到农妇	龚尚群(215)
我的军旅生涯	张胜煌(221)
鸦片烟在桑植的泛滥	龚尚群(226)
刚离虎口 又罹狼群	龚尚群(232)
官场咄咄怪事	黄治才(238)

补 白 篇

清明时节两纷纷.....	(195)
囊萤夜读者.....	(35)
何畏鬼.....	(50)
姜三莽捉鬼.....	(37)
马日事变.....	(170)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68)
建国后史料征集参考提纲.....	(241)
编后记.....	(243)

国际公法研究员陈伯陶

朱泽云

陈伯陶，桑植县城人，生于1890年，名文钧，字伯陶。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曾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取得学士学位。继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国际法硕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被康乃尔基国际和平研究会选任为国际公法研究员，历时两年，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候选博士学位。“五·四”期间曾任我国留美学生会会长，颇有爱国热情。回国后极力效法西方，曾在湖南附会赵恒惕的“联省自治”，推行美国联邦自治法。终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没有民主，自治不能，而烟消云散。而他本人也受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配，数十年混迹于国民党政府官场。

陈伯陶幼年从师谷云青先生，天资颇高，八岁即能写文章。1904年考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在常德），开始接触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那时满清政府已腐败不堪，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陈伯陶与同学中的佼佼者——林伯渠、蒋翊武先后秘密参加集兴会及同盟会。经常阅读当时宣传革命的秘密刊物《黄帝魂》、《洞庭波》、《浙江潮》、《二十世纪之支那》以及同盟会主办的《民报》，思想颇受影响，常集资购售上述刊物，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不久被校方查悉，陈伯陶与谷师韩、黄承钧等六人被开除学籍，并遭通缉。陈伯陶乃改名陈国钧，潜逃至上海，就读上海中国公学。陈伯陶在课余之暇，常与同学讨论西欧各国建设情况，特别是在十里洋场的上

海，他看到租界地的种种完善设施，远非华人区所能比拟，既叹国家贫穷落后，又慕西方文明发达。于是产生出洋留学的念头。但因没有机会，愿望没能实现。1908年，他潜回长沙报考高级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没被录取。旋即入美国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预科，作出洋准备。在这期间，陈伯陶仍与在校师友辛共生、向哲濬等秘密宣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创立学生自治会，组织嘤鸣会（取嘤鸣，求友之意），宣传恢复汉业、救国图存的道理。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湖南首先响应，嘤鸣会出力不少。雅礼大学当局遂将陈伯陶、彭莹等人开除学籍，陈伯陶便转入广益大学就读。这时在南京任留守的黄兴，意欲激励青年，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要他资遣有志之士赴各国留学。陈伯陶以两次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开除学籍的影响，被派赴美，入美国米歇根大学。但未到半年，北洋军阀汤芳铭继谭延闿督湘，以陈伯陶为同盟会革命党人，将其公费取消。陈伯陶得到友人吴维岳、吴赢的帮助，转入伊利诺（斯）大学半工半读，并先后参加威士康星大学、阿海阿大学及弗锦尼亚陆军大学暑假学习，兼贩报章杂志维持学费。1916年，谭延闿二次督湘，陈始得恢复公费，继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国际公法。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陈伯陶在美国与同学董维键、王伯衡等人组织爱国委员会，并被推选为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在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他用英文撰写《山东问题》、《废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和《为什么中国拒绝和约签字》等文，集资印发，广为宣传，对当时国内“五·四”运动起到支持作用。

1920年，地方军阀为了掩饰各自的封建割据独霸一方的狰狞面目，打出“联省自治”的旗号，欺骗民众，湖南军阀赵恒惕，就曾因此喧嚣一时。他高唱“联省自治”，借口“出兵援鄂”，意欲置鄂于自己控驭之下，因吃了另一军阀吴佩孚的败仗，才偃旗息鼓。那时远在美国的陈伯陶，遥闻国内在搞“联

治”运动，喜不自胜。认为“联治”就是容许多省制定宪法，实行自治，再由自治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国家宪法，组成象美国那样联邦制国家，就可避免军阀混战，为民造福。于是抱着极大的希望回国，以施展宏图。无奈这种洋绅士的观点，只是一种粉饰资产阶级宪政的涂料，反而为军阀装饰门面，起了为虎作伥的作用。

1920年冬天，陈伯陶回到桑植老家，这时，赵恒惕的“联省自治”闹剧，正粉墨登场。首先制定省宪法，由各县推荐一名审查委员，组成省宪法审查委员会。当时桑植县城戴着顶子帽和博士帽的土绅士、洋绅士们都在极力钻营省宪审查委员的头衔。陈伯陶虽有心涉猎，但苦无门路，欲行乃止。恰好这时贺龙担任靖国军独立营营长，驻防桑植。他听说陈伯陶从美国留学回来，便极力推荐陈出任省宪法审查委员，那些土洋绅士见贺龙已“定了盘子”，只好善自罢休。1921年4月，陈伯陶由县晋省，出任省宪审查委员会委员。同年八月，就任湖南省立（常德）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省二师前身原系西路师范学校）。那时贺龙同志正驻军常德、桃源一带，彼此常相往来，交谊颇厚。1922年春，陈伯陶应聘到长沙省立高等工业学校任教并兼任省法制编纂委员会委员，省财政委员会委员，复当选为省议会议员。旋即又任省务院书记官长。这时，陈伯陶的“联治”运动的好梦正酣，先后代表省议会前往湖北、江西、安徽、江动、浙江等省宣传“联治”。但这些地方的军阀均不买他的帐。赵恒惕也只是利用陈等为之当吹鼓手，装璜门面而已。而所谓自治，也仅仅是一种形式。湖南行宪多年，各项实权仍握在大小军阀之手，省宪纯属一纸空文。陈伯陶渐渐从“联省自治”的迷梦中醒来，乃于1923年辞去省务院职务，改任省长公署参事，并应聘到省立商业专科学校讲授经济学。不久，湖南省立商专、法专、工专三校合并，改组为湖南大学，未设校

长，由委员十人组成行政委员会执行学务。陈伯陶被任为行政委员之一，由该会推选为总务长，综理全校事务兼经济学教授。其时军阀专横，教育经费多被移作军费，不但办校困难，连教师工资也时有拖欠。陈伯陶教育救国的心愿，也只是耗费在奔走求索经费之中。

1924年冬，贺龙同志率讨贼联军随熊克武出师北伐，由川入湘。后来熊克武被囚禁广州。赵恒惕力逼川军出湘。贺龙同志为了保存实力，整训部队，驻守湘西澧州（今澧县）一带，等待时机，并托陈伯陶与赵恒惕谈判。赵恒惕慑于贺龙的军事实力，在湘人治湘的口号下，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辖湘西十多个县，妄图以此绊住贺龙北伐的手脚。不久，孙中山逝世，广州军政府与西南军阀分裂，北洋军阀加强了对南方的攻势，依附北洋军阀的赵恒惕即乘机阴谋调兵围攻澧州。陈伯陶闻讯，昼夜由长沙奔赴澧州，给贺龙密报湘军部署，贺龙得以率领部队安全转到湘川边界。1926年夏，北伐军进入长沙，贺龙率北伐军左翼第一师出师澧州一带，陈伯陶辞卸湖南大学校务，前去拜访，意欲随军北伐，而又徘徊不决，乃乘便回乡。不料回乡竟患风瘫重病，经年不愈。1927年冬复到长沙，经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电召，前去汉口担任总司令部秘书，旋又改任汉口市第二特别（即旧俄租界管区）区管理局主任秘书。当时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陈伯陶曾为原任湖南省党部宣传部长的学友董维键，暗通信息，并帮助他搭上三北轻船公司客轮，安全脱险。稍后董维键在南京被捕，亦得陈伯陶多方营救出狱。1929年春，陈伯陶由汉口赴南京，就任国民建设委员会简任秘书，并兼任当时中国建设协会发行的《中国建设》月刊总编辑，直到1938年抗日初期，张治中先生主持湘政时，回湘担任长沙副市长为止。1939年后，陈伯陶辞职赴重庆，先后担任过中央太

学、重庆大学教授。1942年起，先后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总务司司长，经济部矿业司司长等职。1949年8月，随程潜在长沙参加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后曾担任湖南大学教授，湖南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政府参事。1953年春在南京病逝，享年63岁。

陈伯陶先生学识渊博，有爱国思想和爱国热情，但他一直找不到真正的救国之路。早年，他在羡慕西方自由、信奉国内“自治运动”的思想支配下，多年为“联省自治”奔走，但一事无成；此后又试图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但亦一事无成；尔后，又混迹官场，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直到解放，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才找到真正的出路，就象一个人从梦幻中醒来面对全新的现实一样，他的思想才有了改变。正如他在一份自我总结中所说的那样：“……几十年来，我抱着个人主义的思想，一切靠自己，一切为自己，虽未直接危害人民利益，却为反动统治者服务，耗费了人民的财富。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我深深体会到，经过这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的本质已经改变了，这次改变是现实的，只有现实的改变，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的看法和理想。”

（作者原系桑植县政协副主席，现任《民族团结》杂志社党委副书记。）

杨云阶自传

杨云阶于1894年10月，生于湖南省桑植县白竹坪茅垭的一个贫农家庭。13岁时读孔学二年，自后一直务农为业，至30余岁。父亲杨位超，于1930年逝世。母亲胡氏，于1952年去世。我兄弟两人，胞弟杨青森，现住桑植茅垭，至于亲族等，因解放前湘西桑植茅垭一带地方，国民党烧杀厉害，同时，多年来亲族死亡迁居的不少，现存的也不多了。解放后，对其情况很不了解，也没有通信联系。我原在家时，生有两男一女，现尚有一子一女，1951年，呈报中南委员会批准，将儿女迁居澧县合口镇居住。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的2月，贺龙元帅和周逸群等同志来到桑植，号召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当时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没收地富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所有。我看到这样的主张和标语，心中十分高兴。于1928年三、四月间参加了当地红军设的党部革命活动。我地保长和乡长即在桑植县指控我通共，并扬言要捕杀我，烧我的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便离开了家庭，正式参加了工农红军第二军，分配到第二中队当战士。不到一年光景，我们壮大起来了，由警卫营改编为红二军警卫团，我任团部的供应部主任。这时我们在湘鄂川黔边游击和宣传革命的主张。不久红军进一步壮大，得到广大工人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开辟桑鹤两县为红军的根据地。

我于1929年3月，在鹤峰县的鄢阳关参加了共产党，介绍人是李瑞秋、贺沛卿，入党仪式是在陈宗瑜家的前山举行的。军队派来了李良耀、万涛二同志谈了话，又引导我宣誓，我才

知道红军是党领导的。……1930年，红二军奉中央指示，东下洪湖，我在团里又兼做总支副书记工作。同年的四、五月我们到达洪湖地区，整编二、六两军的部队，打击了敌人。在九、十月间，又渡江南岸，配合红一军攻打长沙。我们红二军团过江，就攻克了南县、华容县，一直打到津市、澧县、石门、安化，并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十一月我们进入鹤峰走马坪，消灭川匪甘占元全部，在那里休整部队。大概在1931年1月，前委任命我为桑鹤游击总队政治委员，并指示参加湘鄂川黔特委会，任务是巩固湘鄂川黔边苏区，扩大开辟新的苏区。我们的游击队是壮大了，苏区发展了。1932年11月间，贺龙、夏曦、关向应等率主力红军又回到鹤峰县城桑鹤游击总队，才与二军团会师鹤峰县毛坝坪。那时高兴得很，有了党的领导。我于1933年的一、二月间调军团部工作。我到军部后，贺、夏、关三位首长给我谈话，交付我的工作任务是当前部队中疾病流行严重，要我作卫生工作。夏主席说，调你的工作并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当时我还不愿意干卫生工作，但贺军长又下了命令，只好服从，从此我就干起卫生工作来了。当时我了解情况，除伤兵外，病号就有两千多，连队每天还有担架送来，还有军直和师直的。2月8日部队整个行动，在出发前，关政委来卫生部口头宣布我为二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

由于夏曦主席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解散了部队党的组织，大肆逮捕师、团、营、连、排的干部，部队人心惶惶。卫生部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从保卫机关释放而来的，编有伙夫队和担架大队，共有七八百人。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二军团打下四川彭水县城，渡过乌江，进入贵州，取得务川、沿河两县城为根据地，扩大了印江、德江、松桃等县。在这小小的苏维埃根据地的环境下，贺、关二同志在南腰界召集了一个党员积极分子会议，我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是和夏主席作斗争，贺提出

质问，我还记得两点，一、质问夏主席两三个月的时间，对中央的报告，尚未写出来的原因何在？而中央的交通不能很快的回去，中央不能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得不到中央指示。二、肃反为什么解散了党的组织，不要党，到今天为止要清查一下，是不是党的组织都是改组派，要弄个明白，我们部队还是要建立党的组织。这个会开得很好，以后部队的情况就有了好转。

我们在黔东的沿河、务川、德江、松桃、印江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了苏区，一直到1934年九月、十月间，由任弼时率领的六军团会师于松桃县的牟旺市，这才得到中央的指示。在沿河县的南腰界召开了会师大会，决定很快打进湖南去，不几天就出发了。经四川的酉阳县城就打到永顺县城，以永顺为根据地，又取得了大庸、桑植、慈利等县，一直打到桃源、常德，我还是在卫生部工作。

我总是随军工作，这里提到1935年时，国民党围攻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在陈家河消灭了58师陈耀汉部的172旅，并活捉旅长李延龄。长征时，我调二方面军军部任参谋工作，直到与一方面军会师，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变”。

从“西安事变”以后，停止了国内战争，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我随军开赴前线服务，进入山西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于1938年12月，又随师部开往河北冀中对日作战，还是为军队的健康服务。这里搞了九个月时间，又随军回晋，走到冀中的炉底村，我面向贺龙同志要求，要去武汉一带打游击，这是思想的变化，贺不同意，给我说服教育，这样随军回到晋绥。1940年，因经常在游击环境下生活，把身体搞坏了，只好休息。1941年2月，通讯员叫我去司令部，贺、关又叫我去任卫生部政委，当时我不愿意，提出要求到延安学习，这样于1942年，随贺龙

一道去延安。二月到达，三月进入中央党校，于1945年10月出校到晋绥工作。1946年又去卫生部工作。1947年调军区政治部任联络部副部长，这段工作与分局城工部密切联系，随时了解敌人动向，再办军团教导团工作。自太原攻克之后，1949年我们整个军区迁临汾县城，九、十月，我向组织写了报告，要求南下，组织批准了我的要求。1949年12月到中南局组织部报到，分配我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南分署任第一处处长之职。

1953年11月，中南行政委员会命令调我到文委卫生局工作，任医疗预防处处长，12月到职，组织服从，思想上未乐意。

1954年9、10月中南文委撤销，组织分配我到湖南人民检察院工作，12月到职。

（杨云阶同志原任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委员、湖南卫生厅副厅长等职，因患高血压，动脉硬化，心力衰竭，于1961年7月30日上午11点在广州从化温泉疗养院逝世，享年67岁。）

市及1981年10月，对党史进行了全面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发现刘开锡烈士的事迹，遂决定为其立传。刘开锡烈士，湖南桑植人，1905年6月出生，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牺牲。刘开锡烈士的事迹，在桑植县志中已有记载。为纪念刘开锡烈士，特为其立传。刘开锡烈士的事迹，在桑植县志中已有记载。为纪念刘开锡烈士，特为其立传。

刘开锡，于1905年6月，出生于桑植县刘家坪乡双溪桥村的一户农民家庭。1928年，23岁时参加工农红军。他幼时，家庭贫困，兄弟四人，他居长，二弟开职、三弟开然、四弟开定。他只读两年私塾就随父下地劳动。稍长，给地主家做工为生。在那灾祸频仍、民困难苏的年月里，年轻的刘开锡就饱受生活的艰苦。

1924年，他19岁时，常见本县在外地读书的学生彭玉珊、朱慈堂、谷及峰（均已加入了共产党）等人，寒暑假回来，组织宣传队伍，在双溪桥墟场上宣传，演出了《为富不仁》、《春哥叫弟》、《捉肥猪》等戏剧，刘开锡看了感到新奇。这年寒假学生宣传队又来双溪桥场上演戏，当时，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但看戏的群众，都为他们的精彩表演和那富有革命性的剧情所吸引，没有离开剧场。刘开锡站在舞台最前面，看得更加入迷，时而怒气横生，时而笑容满面。其爱憎之分，尤为显明。此后，他以赶场为名，尾随宣传队听其宣传，并将内容传之全家，喻之乡邻。当他听到财主们说：“宣传队是宣传‘赤化’，是提倡‘共产’的犯上作乱言行。还扬言要报县警察局把他们抓起来等言论后，刘开锡对当地财主愤怒不已，他从心底钦仰这些革命性的宣传。

1926年底，中共湖南省委派农运特派员谢策智（中共党